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2002-2014年)

卢凌宇

内容提要:全球化是产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以及观念和规范跨境扩散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四个维度。对于西欧国民而言,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廉价产品和服务,但加剧了贫富分化和工作机会的流失;政治全球化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产生少量的经济和生命成本;社会(文化)全球化既满足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又威胁到文化、经济和人身安全;人口全球化在降低生活成本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安全问题和巨额的社会福利支出。总体上,全球化降低了西欧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基于2002-2014年“欧洲社会调查”数据的跨层次回归分析以及稳健性检测支持了本文的假设,即全球化在总体上降低了西欧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中经济全球化、社会(文化)全球化和人口全球化与结果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政治全球化则未能显著地增进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此外,欧洲一体化既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又是针对全球化负外部性的保护带,因而显著提高了西欧国民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全球化 欧洲一体化 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宏大的历史进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人口等多个维度。它的主要特点是物资、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以及观念和规范的跨境扩散。关于全球化的起源和成因,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供了不同的见解。^① 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在通信、信息和运输等技术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加速推进了全球化。^② 20世纪80-90年代是全球化的“黄金时

^① Geoffrey Garrett, “The Causes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3, No.6/7, 2000, pp.941-991.

^② 卢凌宇:《论冷战后挑战主权的理论思潮:重新思考国家主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余南平:“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欧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37页。

代”。在这个阶段,国家衰落论、全球国家论等唱衰民族-国家的理论一时甚嚣尘上,蔚为大观。^①

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化的负外部性逐渐显露,并且似乎压倒了它所带来的收益。虽然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但大量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公开抵制全球化。^②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全球化所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和失业、贫富高度分化以及移民、难民问题,激化了这些国家内部全球化受益群体与利益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6年6月23日,英国通过全民公决决定脱离欧盟。同年,保守主义色彩极重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当选第四十五任总统。在2017年4-5月的法国大选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Marine Le Pan)虽然未能最终赢得大选,但其支持率和影响力急剧上升。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公民抗议和反对全球化的表现。

全球化的一个道德和政治初衷是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市场经济来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然而,反全球化潮流的涌现却似乎暗示了全球化的福利效用是负的:它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这才导致了发达工业化国家公民用投票和公决的方式来表达对全球化的强烈不满。这个状况在西欧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09-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化日益遭到西欧国民的抵制,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有所减缓,极右翼政党在丹麦、法国和奥地利等国的崛起以及英国脱欧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

近代以来,西欧一直是引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之一。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并通过殖民扩张将这个崭新的国家形式传播到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实现持久和平,西欧国家又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试图超越主权国家体系,后一种努力以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的签署为标志而到达了一个高峰。所以,西欧的政治发展无论是成功还是受挫,都对地区乃至全人类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所谓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普遍较高。按照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的选主理论(the selectorate theory),^③在民主程度较高的政体中,选主的规模较大,相应的,

① 卢凌宇:《论冷战后挑战主权的理论思潮:重新思考国家主权》,第46-181页。

② 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李扬、章添香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③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pp.77-105.

“获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的规模也较大,这就导致统治集团在内政外交中不得不关注和尽可能满足支持者的利益诉求。据此,近年来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现象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群体通过投票等政治参与形式向统治集团施加影响产生的结果。换言之,弱势群体对全球化下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满意,所以采取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公民的“满意度”成为联结全球化和国内政治变化的中间变量。所以,西欧公民对全球化的评价,既是判断西欧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又是重塑全球化的关键。

本文旨在从理论上探讨全球化对西欧国家公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对由此产生的理论假设进行经验检验。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全球化显著地削弱了西欧国民的幸福感程度。除导论之外,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供了非常简要的文献述评,通过对主观幸福感和全球化研究相关文献的回顾,突出本文选题的理论价值;第二部分简要探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是理论建构,目的是演绎出全球化不同维度作用于西欧国家公民幸福感的几个因果机制,并提出可供检验的理论猜想;第四、五部分设计并实施了经验检验;结论部分总结全文,进一步探讨本文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并提出若干下一步要回答的研究问题。

一 主观幸福感与全球化:一个简要的文献述评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指人类积极的心理感受。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或维度,共同构成幸福科学研究(happiness study)的主要因变量。第一个层次是通常所谓的“快乐”或“幸福”(happiness),主要指人的积极情感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时性;第二个层次是所谓的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即个人对某个时间段内自身生活状况的认知和评价。从时间上看,这个概念显然是历时性的。从内容上看,它既重视情感,更强调认知。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则是第三个层次上的幸福感。如果说快乐和生活满意度只涉及人的内心感受,那么生活质量则是主观感受和客观条件的综合。^①比如,一个收入水平低下的人可能会自我感觉很快乐,但这样的人由于难以实现“财务自由”,所以总体的生活质量往往偏低,或者至少低于他自己所感受到的水平。幸福科学主要致力于前两个层次上人类幸福感的研究。至于较为偏重物质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则是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内容。

^① 在本文中,除非特别说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三个词将交替使用。这也是幸福科学研究的常见做法,参见 Helen Johns and Paul Ormerod,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7, p.22。

对主观幸福感的经验研究集中于探讨 SWB 的影响因素或机制。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产出、制度设计和文化设施,目的都是为了让具体的人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感。因此,也有学者指出,把 SWB 称为“社会科学的终极因变量”是恰如其分的。^①

SWB 是天然的跨学科领域。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等都对该领域的知识积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② 例如,在幸福科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如攀比 (comparison)、民俗/文化 (folklore) 和宜居性 (livability) 等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贡献。^③ 相比之下,政治学家在这个研究领域却建树不多。迄今为止,政治学家对 SWB 的探讨集中于少数几个影响因子及其变体,包括民主体制、社会资本、政治行为者(如政党),以及政府规模和质量。也有政治学家反过来探讨 SWB 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比如税制选择。^④

在政治学的学科光谱中,幸福感研究基本属于比较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的范畴,来自国际关系学者的贡献则几乎付之阙如。就笔者有限的涉猎所及,2013 年米勒 (Steven Miller) 的一篇论文尤其值得关注。在该文中,米勒测试了国际领土冲突对 SWB 的影响。他发现,主观幸福感受领土冲突的性质而非领土冲突有无的影响,但领土冲突的性质却发挥了如下作用:在一场领土冲突中,冲突发起国的国民会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SWB 会得到较大的提升;相比之下,冲突目标国的国民则会由于国家被动受到攻击而深感沮丧,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同时由于承担战争带来的税负而滋生不满情绪,这些都会导致 SWB 显著下降。^⑤ 尼可洛娃 (Milena Nikolova) 和尼可拉夫 (Boris Nikolaev) 则测试了 2007 年欧盟东扩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新成员国公

^① John Helliwell and Robert Putnam,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 in Felicia Huppert et al. eds.,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435-460.

^② 文献综述参见 Edi Diener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25, No.2, 1999, pp.276-302; Amitava Dutt and Benjamin Radcliff eds.,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9, pp.1-23; Derek Bok,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31.

^③ 对三大理论的探讨和检验,可参见 Ruut Veenhoven, “The Cross-National Pattern of Happiness: Test of Predictions Implied in Three Theories of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34, No.1, 1995, pp.33-68.

^④ Alexander Pacek, “Politics and Happiness: An Empirical Ledger”, in Amitava Dutt and Benjamin Radcliff eds.,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pp.231-255. 近期关于政治因素对主观福利影响的探讨,参见 Yiping Wu and Jiangnan Zhu, “When Are People Unhappy? Corruption Experience, Environ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7, No.3, 2015, pp.1125-1147; Daniel Hummel, “Inter-State Internal Migration: State-level Well-being as a Caus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7, No.5, 2015, pp.2149-2165; Jeremy Jackson, “Free to Be Happy: Economic Freedom and Happiness in US Stat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8, No.4, 2016, pp.1207-1229.

^⑤ Steven Miller,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0, No.6, 2013, pp.677-690.

民幸福感的影响。他们发现,上述影响在两个国家都是显著的,但在前者是积极的,而在后者则是消极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两国在2007年入盟时,保加利亚人对于欧盟的信任度已经增长了,但罗马尼亚人并非如此。此外,2007年罗马尼亚激烈的选举斗争也抵消了入盟本应产生的积极效应。^①

如果说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半壁江山是研究环境、制度和文化等外部约束如何影响SWB,^②那么国际关系因素和机制的更多介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文的一个可能的贡献就在于探讨全球化这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日益重要的国际因素如何作用于西欧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新千年前后,全球化研究虽呈井喷之势。但总体上看,相关研究却很少讨论全球化如何作用于个人。因此,在汗牛充栋的全球化文献中,关于全球化如何作用于个人福利的研究却显得几乎微不足道。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献都把因变量设置为若干物质性的个体福利,如人类发展指数、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和生命预期。^③因此,本文的另一个可能的贡献则是尝试将幸福科学“嫁接”到全球化研究。

二 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

二战结束以来,西欧政治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和特点莫过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因此,要研究全球化对西欧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是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关于两者的关系,学者们持不同的观点,并且集中于全球化的经济层面。以科林·海(Colin Hay)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就是一

^① Milena Nikolova and Boris Nikolaev, “Does Joining the EU Make You Happy? Evidence from Bulgaria and Romani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8, No.6, 2016, pp.1593-1623. 此外,也有学者探讨国际经济关系与SWB的关联性,参见 Ozan Eksi and Neslihan Kaya, “Life Satisfaction and Keeping Up with Other Countri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8, No.1, 2016, pp.199-228.

^② Kennon Sheldon and Sonja Lyubomirsky, “Change Your Actions, Not Your Circumstance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Sustainable Happiness Model”, in Amitava Dutt and Benjamin Radcliff eds.,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pp.285-298.

^③ Ming-Chang Tsai,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Human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81, No.1, 2007, pp.103-126; Andreas Bergh and Therese Nilsson, “Good for Liv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World Development*, Vol.38, No.9, 2010, pp.1191-1203; Nisha Mukherjee and Jonathan Kriekhaus,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3, No.2, 2011, pp.150-170.

部“去全球化”的历史,后发的一体化进程削弱了更早出现的全球化趋势。^①他考察了11个欧洲国家,发现除了芬兰以外,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都是与邻国的贸易占支配地位。在外来直接投资领域,情况大致也是如此。^②西欧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政治合法性追求。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与欧盟的合法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眼里,欧盟的合法性部分地归功于保护它们免受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同时按照欧洲人自己的标准来塑造全球化。所以,只要共同体被认为还有能力管理好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合法的。^③

另一派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体化强化和辅助全球化。对于全球化而言,欧洲不仅是被动的作用对象,也是积极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欧洲一体化启动后不久,就开始对全世界施加影响,这在事实上推动了全球化进程。首先,欧共体和欧盟既是全球贸易自由和关贸总协定(GATT)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积极推手,又是国际金融规则的主要创立者。其次,在金融服务、食品、化工和IT等诸多领域,欧洲的规则 and 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欧盟或者一手包办,或者与美国联手制定国际监督规则、行使监管权力。^④欧盟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楷模”,是“有管理的全球化”的践行者,它不是消极地适应全球化,而是试图积极地影响全球化,并在环境、贸易和社会政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⑤

相关学者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观点。比如,针对欧洲国家专门制定政策来阻碍全球化的观点,相关研究并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相反,在财政金融领域,全球化和欧洲化共同解释了贸易联盟的密度以及薪资博弈变化区间的设定。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甚至压倒了一体化,因为“市场改革在欧盟国家之间与非欧盟之间发生的速度相差

① Neil Fligsten and Frederic Merand, “Globalization of Europeanization? Evidence on 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80”, *Acta Sociologica*, Vol.45, No.1, 2002, pp.7-22; Colin Hay, “What’s Globalization Got to Do with It?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Government and Organization*, Vol.41, No.1, 2006, pp.1-23; Colin Hay, “What Doesn’t Kill You Only Makes You Stronger: The Doha Development Round, the Service Directive, and the EU’s Conception of Competitivenes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5, No.1, 2007, pp.25-43.

② Colin Hay, “What’s Globalization Got to Do with It?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Government and Organization*, Vol.41, No.1, 2006, pp.1-23.

③ Wade Jacoby and Sophie Meunier, “Europe and Globalization”, in Michelle Egan et al. eds., *Research Agendas in European Union Studies: Stalking the Elephant*,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367.

④ Mikhail Molchanov,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Vol.4, No.3/4, 2005, pp.431-432; Wade Jacoby and Sophie Meunier, “Europe and Globalization”, in Michelle Egan et al. eds., *Research Agendas in European Union Studies: Stalking the Elephant*, pp.361-364.

⑤ Wade Jacoby and Sophie Meunier, “Europe and Globalization”, in Michelle Egan et al. eds., *Research Agendas in European Union Studies: Stalking the Elephant*, pp.366-368.

无几”。可以认为,在欧洲,一体化还不能抵消全球化的影响。^①列维-弗劳(David Levi-Frau)的观点与此类似。^②他发现至少在电子通信这样的基础设施领域,欧洲国家实施市场自由化的方式与全球化影响下的拉丁美洲和其他发达国家没有显著的区别,也就是一体化并没有导致自由化。

根据以上分析,欧洲一体化并非简单地阻碍或者促进全球化。即使欧盟行为的动机是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成员国的集团利益,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努力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推动了全球化。但是,如果全球化与集团利益相违背,欧盟或成员国就会优先考虑地区或国别利益,不惜为全球化设置障碍。欧洲既是全球化的先锋,在消除劳动力、物资和资本(跨国)流动的障碍方面功不可没,又是针对全球化下的(经济)不确定性和文化威胁所形成的保护带。^③正如迈尔(Thomas Meyer)所言,欧洲一体化这样的地区主义既是全球化的表达方式,又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条路径:“地区虽然不是整个世界,但大到足以在经济、生态和安全领域开展有效的跨国协调;地区往往整合那些具备共同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国家和社会;地区能够强大到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担当有效的行为者;同时,正是通过区域合作,在所有政策领域不合作的损失与合作的收益才能最直接地呈现出来”。^④由于研究问题的导向不同,本文不针对欧洲一体化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提出假设,但预测它们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

三 全球化与西欧国民的主观幸福感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通常被认为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三个构件,其中经济全球化指日益增长的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跨国界流动。政治全球化涉及国际关系层面的合作与扩张,比如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机制、缔结条约和在外国设立使领馆等。社会全球化涉及国家间非正式交流的程度,包括跨国旅游、国际传媒和其他形式的信息交流,结果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受到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盛行的状况、思想、规范和文化的影响。^⑤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人口的全球化。

^① Daniel Verdier and Richard Breen, “Europe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4, No.2, 2001, pp.227-262.

^② David Levi-Frau, “On the ‘Net Impact’ of Europeanization: The EU’s Telecoms and Electricity Regime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7, No.1, 2004, pp.3-29.

^③ Mikhail Molchanov,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pp.431-432.

^④ Thomas Meyer, “Glob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Stateness”, in Mario Telo ed.,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Springer, 2012, p.129.

^⑤ Nisha Mukherjee and Jonathan Kriekhaus,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pp.153-155.

它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加速跨界流动或跨国移民。移民的动机主要包括寻找工作机会或寻求家庭团聚,也可能是逃避战争或自然灾害。全球化的这几个维度虽然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系。例如,信息交流和文化互动的程度就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人口跨境流动的影响。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全球化诸维度会施加不同的影响,而且在于同一维度的不同侧面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西欧国家都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并且具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尽管德法等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北欧国家区别很大,^①但相对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绝大部分西欧国家都是高水平的“福利国家”。对于西欧国民的主观福利而言,经济全球化施加了相反的影响。跨境贸易使得这些国民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和享受来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产品和服务。按照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领域,欠发达国家往往具有自然和人力资源优势,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初级产品和工业品,而发达经济体的优势则是资本密集、高产品附加值和高劳动生产率,所以通常出口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品。

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生活质量的副作用也很显著,其中最深刻的负面影响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虽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贯穿整个人类历史,^②但全球化无疑加剧了这一状况。^③全球化影响收入差距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改变收入和其他要素价格,借此改变市场收入分配;二是影响政治决定(比如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引导政府改变税收制度和公共支出结构,影响可支配收入的分配。^④比如,根据斯托尔帕-塞缪尔森模型(Stolper-Samuelson model),在经济跨国开放的前提下,一个国家会从本国相对充足的资源禀赋中获益,而从相对稀缺的资源禀赋中遭受损失。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劳动力和资本,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高技术劳动力相对充足,收入会向少数人倾斜,扩大不平等;相反,在欠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是充足的生产要素,贸易会使他们增加收入,降低不平等。有不少学者质疑这个模型,但是后继

^① 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8-34.

^② [美]沃尔特·谢德尔:“强大的均平机:暴力与贫富不均的全球史”,《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6-150页。

^③ 刘明礼:“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现象透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期,第33-34页。

^④ Florian Dorn et al., “Globl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Revisited”, Discussion Paper 056, Fellowship Initiative, “Challenges to Integrated Markets”, July 2017, pp.1-48.

的很多研究发现资源禀赋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①从经验上看,皮凯蒂(Thomas Piketty)研究了18世纪以来全球的财富数据,发现工资收入增长持续低于资本盈利增长,结果就是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②进入新千年以来,贫富分化日益严重。^③随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劳动力的相对优势削弱,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不断拉大。^④贫富差距加剧也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中下层收入群体“反全球化”的根本原因。^⑤

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消极影响是失业。西欧国家工作机会流失有多重原因。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导致本国工作机会大量流失。由于欧洲国家人力成本高、监管力度大,导致资本收益率相对较低。相比之下,欠发达国家则人均收入水平低、制度建设相对落后。出于发展的需要,这些国家往往给国际资本提供特别优惠如税收减免等,以鼓励外来直接和间接投资。这就为发达国家资本外流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与此同时,虽然技术创新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在全球化影响下,跨国技术转移也会让欠发达国家受益。加剧的进口竞争也会激励资本对新技术领域投资,加速技术转移,结果显著减少了对低技能工作岗位的需求。^⑥资本是经济体的“血液”。以离岸生产和技术含量的生产外包等形式的出现资本抽逃会导致投资下降、就业机会减少,其直接的政策结果就是降低了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和谈判能力。^⑦此外,新兴经济体发展迅猛,产业升级加快,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半导体、制药和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

① Wolfgang Stolper and Paul Samuelson,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9, No.1, 1941, pp.58-73; Andy Dreher et al., *Measuring Globalisation: Gauging Its Consequences*, Berlin: Springer, 2008; Andrew Berg et al., “What Makes Growth Sustain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98, No.2, 2012, pp.149-166; Florence Jaumotte et al.,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echnology, or Trade and Financial Globalisation?”, *IMF Economic Review*, Vol.61, No.2, 2013, pp.271-309; Era Norris-Dabla et 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15/13, 2015, pp.1-39; Giray Gozgor et al., “Globalisation,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CESifo Working Paper*, No.5522, 2015, pp.1-37.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译者序”,第5-6、135-160页。

③ 余南平:“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第140页。

④ 徐坚:“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4-5页。

⑤ 刘明礼:“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现象透析”,第33页。

⑥ Eli Berman and Stephen Machin, “Skill-Biased Technology Transfer around the World”,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16, No.3, 2000, pp.12-22; Ariel Burstein et al., “Importing Skill-Biased Technolog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5, No.4, 2013, pp.32-71; Nicholas Bloom et al., “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3, No.1, 2016, pp.87-117.

⑦ Robert Feenstra et al., “Globalis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1996, pp.240-245; Robert Feenstra and Gordon Hanson,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and High-Technology Capital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979-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4, No.3, 1999, pp.907-940; Robert Feenstra and Gordon Hanson,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nd Rising Inequality: A Survey of Trade and Wage”, in Ed Choi and James Harrigan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2003, pp.145-185.

的优势逐渐缩小,也使就业机会不断流失,反过来加剧了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2010年欧洲货币危机更加剧了失业问题。^①经济全球化对西欧国民福利的总体影响取决于廉价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正效应与贫富分化和就业机会流失所导致的负效应之间的对比。幸福科学的经验研究令人信服地验证了不平等和失业对于个人幸福感所产生的强大负效应。^②人类社会的一个特质就是人际比较,而收入水平既是人际比较的一个重要指标,又是阶级划分的标准。弱势群体时常被痛苦、焦躁、压抑、担忧和孤立无助的情绪所困扰,进而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和预期寿命。基于日本和英国较近的证据表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对于群体心理-社会福利产生着显著的影响,较大的不平等严重地损害了公众的社会心理健康。^③就业收入则不仅是个人生存的基本来源,也是个人存在感和自尊的基石。冯·希夫(Christian von Scheve)等发现,一个人在经历失业的过程中,会更多地感到悲伤和忧虑,较少地感受到幸福。失业不仅会降低生活满意度,而且失业者即使重新就业,也无法再回到失业之前的幸福水平。^④对于在业者和失业者而言,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所带来的愉悦程度应该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后者则很可能是由于无法支付价格更高的国产或者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商品。鉴于此,本文假设如下:

(H1)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

全球化虽然首先表现为经济现象和过程,但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安排。经济全球化

① 刘明礼:“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现象透析”,第34页。

② 关于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可参见 Ronald Dantzer and Keith Kelley,“Stress and Immunity: An Integrated View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rain and the Immune System”, *Life Sciences*, Vol.44, No.26, 1989, pp.1995-2008; Ronald Wilkinson,“Income Distribu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304, No.6820, 1992, pp.165-168; Ronald Wilkinson,“Health Inequalities: Relative or Absolute Material Standard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314, 1996, pp.591-595; J. Lynch et al.,“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in Metropolit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88, No.7, 1998, pp.1074-1080; Mah-Jabeen Soobader and Felicia LeClere,“Aggrega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Inequality: Effects on Morbidit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48, No.12, 1999, pp.733-744。关于失业对福利的负作用,参见 Richard Kessler et al.,“Unemployment, Reemployment, and Emotional Functioning in a Community Samp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4, No.4, 1989, pp.648-657; Mikael Nordenmark and Mattias Strandh,“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Well-Being among the Unemployed: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Sociology*, Vol.33, No.3, 1999, pp.577-597。值得一提的是,不平等对健康/幸福的作用受制于文化背景,比如美国人对不平等的评价就与西欧和日本人相反,参见 Alberto Alesina et al.,“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88, No.9, 2004, pp.2009-2042; Toshiaki Tachibanaki and Sayaka Sakoda,“Comparative Study of Happiness and Inequality in Fiv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Toshiaki Tachibanaki ed., *Advances in Happiness Researc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pringer, 2016, pp.97-118。

③ Dimitris Ballas et al.,“Happiness, Social Cohe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ies in Britain and Japan”, in Toshiaki Tachibanaki ed., *Advances in Happiness Researc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119-138。

④ Christian von Scheve et al.,“The Emotional Timeline of Unemployment: Anticipation, Reaction, and Adapta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8, No.4, 2016, pp.639-655。

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全球化的结果。^① 全球市场有着强大的制度基础,“商品、服务和人员得以自由流动的堤坝是由国际体系的设计师制造并调节的”。西欧国家就是全球化主要的设计师之一。^② 不过,政治全球化对 SWB 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总体上可以认定为积极的。无论是缔结条约、建立使领馆、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定,还是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行动,它们对本国公民主要的效用在于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国际公共产品。例如,使领馆的建立会为本国公民到驻在国旅游、访学和交流提供巨大的便利。而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样的国际组织,则增强了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凝聚力,共同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捍卫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结果也会让本国国民受益。当然,政治全球化在产生收益的同时,也制造了成本。比如,建立和维持使领馆需要财政投入;参与联合国或北约的维和行动不仅需要出钱出力,而且本国维和人员很可能因公殉职,导致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这些都是公共财政的负担。但是,相对于政治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它所产生的成本是较小的。所以,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

(H2) 政治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上升。

社会全球化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在当代世界的跨文化接触中,发达工业化国家占据显著的优势地位。由于收入水平的优势以及通信技术和交通手段提供的便利性,西欧国民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国门、环游世界。虽然二战之后西欧丧失了世界政治的霸权地位,但现代世界是由西欧国家按照自己的形象缔造的。源于西欧的商业文化和商业品牌风行全世界。美国文化也是西欧文化在新大陆的变体。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思想、规范和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欧洲印记,这会让欧洲国民形成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

全球化在传播西欧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同时,也给西欧带来思想和观念上的冲击。例如,全球化被恐怖主义者视为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邪恶力量,必须予以终结。对于某些非西方的社会而言,全球化被认为挑战或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核心价值,引发了个体强烈的不安全感。国际恐怖主义既是对西方文化和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不安全感的回应,又反过来在西方社会制造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全球化现象:强化国家边界、国内政治极端化、民粹主义蔓延、反移民和难民流入等。^③

所以,全球化产生了上述两种相反的主观福利效果。如果说前一种效应满足的是个人自尊和优越感的需求,后一种效应则威胁到人们的安全。如果说前者是“得”,而

^① Florian Dorn et al., “Globl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Revisited”, pp.1-48.

^② Wade Jacoby and Sophie Meunier, “Europe and Globalization”, in Michelle Egan et al. eds., *Research Agendas in European Union Studies: Stalking the Elephant*, pp.360-362.

^③ 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131-132、150-155页。

后者则是“失”。按照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的“前景理论”,^①个人在作判断和选择时会受到“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的强烈影响,即“失”所导致的成本会压倒“得”所带来的收益。基于这个考虑,本文的第三个假设是:

(H3) 社会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

人口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构件,被有些学者称为全球化的第三波浪潮。^② 欧洲作为发达经济体都是外来移民的净流入地,这个过程从1950年代持续至今,只是在1970年代初被石油危机短暂打断。冷战终结以及欧盟扩大,进一步加速了移民的迁入。^③ 根据欧洲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3年欧盟28国外来移民至少达到340万人(净流入60万人),其中来自非欧盟成员国的有140万人,在德国、英国等国移民数量更是分别达到69.27万人和52.6万人,具有非本国公民身份的比例分别达到87.6%和85.5%,而来自于非欧盟成员国的移民数量也超过40%。^④

从冷战结束后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西欧国家在支持成员国之间移民和不得不接受大量难民涌入的同时,对于来自第三世界的常规移民施加日益严厉的限制。例如,法国政府通过颁布《帕斯格瓦法案》强调“法国不再是一个移民国家”,为了防止境内更多的跨境移民延长居留时间,拒绝为跨境移民发放长期的居留许可证,这使得跨境移民及其子女很难在法国获得10年期的居留证。^⑤ 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和随后蔓延开来的欧债危机打击了欧盟和欧元区,减缓了一体化的步伐,此后爆发的叙利亚内战造成的难民涌入进一步加剧了移民危机。欧洲政治日益民粹化和两极化。经济衰退和政治冲突导致法国国民阵线、希腊“金色黎明”等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迅速上升。

西欧国家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改变,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移民问题“安全化”。二战结束以来,移民在欧洲始终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其危险性在政策文件、领导人

^①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 No.2, 1979, pp.263-291; Jack Levy, "Prospect,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1, 1997, pp.87-112.

^② 转引自刘明礼:“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现象透析”,第33页。

^③ 值得注意的是,西欧虽然是移民的净流入地,但移民流出的绝对量并不小。比如,在2000-2010年间,德国每年对外移民约60万,约为总人口的0.8%,其中绝大多数为没有德国国籍的外国人,德国公民所占的比例很低。在1991-2012年间,外国人从德国移民出去的比例为9%,而德国人占比为0.15%。参见 Marcel Erlinghagen, "Anticipat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before Emigr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 Panel Data", in Toshiaki Tachibana ed., *Advances in Happiness Researc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229-244.

^④ 数据转引自朱浩:“欧洲移民潮中的公民身份和福利政治”,《欧洲研究》2017年第2期,第54页。

^⑤ 同上书,第57页。

讲话以及媒体和公众中被反复地建构和放大;①二是移民流入所导致的巨额社会福利支出。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福利和经济安全吸引着经济衰败国家的公民。移民潮带来的社会支出不断增加以及新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的持续冲突正侵蚀着福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非法移民和难民潮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社会支出的不断增加使得欧洲各国本已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不堪重负。如德国2016年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3%,大大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而这并不包括用于难民的费用。②

移民所导致的社会治安问题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也使本土居民产生强烈不满,引发对政府移民政策的严重质疑,成为欧洲政治极右翼思想泛滥的温床。③不仅如此,以中东穆斯林为主的外来移民具有不同的文化、族性和语言背景,短期内难以适应和认同目的地的文化,很容易激发文化矛盾。人口比例的变化影响到主体民族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加剧了他们对移民的敌对和排斥态度。早在2000年,对移民持消极态度的欧洲人占到38%,而在此前的1999年,这一指标为26%,1992年仅为15%。④有学者甚至认为,外来移民是导致美国和欧洲从全球化的支持者转为反对派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2016年6月23日退欧公投的最直接动因就是民众对移民的恐惧。⑤

由于地缘关系,中东和北非国家是欧洲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和难民的主要来源地。鉴于西欧国家人口增长率多年来持续走低,移民为欧洲国家提供了紧缺的劳动力。由于移民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普遍比欧洲国民低下,他们往往从事原住民所不愿意从事的技术含量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工作,沦为事实上的无产阶级。⑥这些工作对于经济的运转不可或缺,但附加值和劳动力价格都比较低,所以间接地降低了欧洲国民的生活成本。但是,至少从短期来看,人口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个主要收益显然远远低于它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所以,本文的第四个假设是:

(H4)人口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在欧美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断负面化,“反全球化”浪潮

① 周庆安、吴燕妮:“身份认同困境下的话语构成:从难民危机报道看欧洲身份认同”,《欧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9页。

② 数据转引自朱浩:“欧洲移民潮中的公民身份和福利政治”,第53页。

③ 朱浩:“欧洲移民潮中的公民身份和福利政治”,第54页。

④ 陈源川:“欧洲移民日子越过越难”,《环球时报》2002年5月30日第3版;转引自朱浩:“欧洲移民潮中的公民身份和福利政治”,第57页。

⑤ 刘明礼:“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现象透析”,第33页。

⑥ 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欧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0页。

甚嚣尘上,让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备受压力,政治上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从华沙到华盛顿,左和右的政治分野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开放还是封闭……那些超越了传统党派界限的问题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欢迎移民还是把他们拒之门外?开放贸易还是保护本国工业?拥抱还是抵制文化变革?”^①可见,西欧民众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忧虑已经压倒了对全球化积极效应的计算。据此,本文假设全球化四个主要维度中的三个——经济、社会和人口——都对欧洲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假设包括人口全球化在内的全球化综合影响也是消极的:

(H5)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

四 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分析单元是个人/年,统计样本中的西欧包括除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十八个欧洲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统计分析使用的数据覆盖个人/微观和国家/宏观两个层次,其中微观层次的变量都取自“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 ESS)。自2002年起,该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至本文完成之际,已经发布了六轮调查数据。本文的经验研究覆盖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七个别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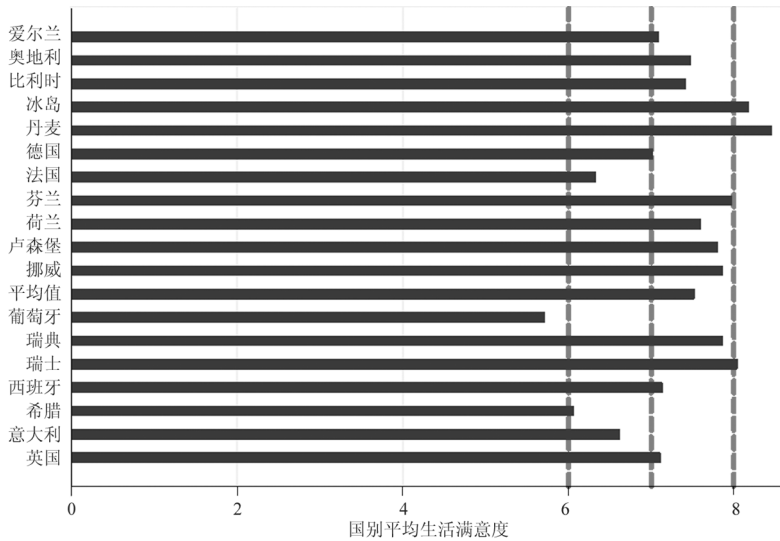
(一)因变量

统计分析的因变量是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这是一个微观层次的定距变量。在ESS中,被调查者要回答的问题是:“总体上,你对这段时间自己的生活有多满意?”答案共分十一个刻度,从“很不满意”(0)到“很满意”(10)。分值越高,表明个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在本文观察期内,西欧国民的平均生活满意度见图1。

图1显示,2002-2014年间,西欧十八国国民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值是7.5,其中最小值为葡萄牙的5.7,最大值为丹麦的8.5。绝大部分国家的数值都大于7.0,倒数后三位中除了葡萄牙外,还包括希腊和法国,二者都低于6.5,分别为6.1和6.3。

^① “The New Political Divide”, *The Economist*, July 30, 2016,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702748-new-divide-rich-countries-not-between-left-and-right-between-open-and>, last accessed on 15 November 2017.

图1 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2002-2014年)



数据来源:ESS 网站, <http://www.europeansocialsurvey.org/data/>, 2017年10月12日访问。

(二) 自变量

经验研究的自变量是宏观/国家层次变量,共五个,分别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人口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指数,后者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的权重加权平均数,三者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6%、27%和37%。这四个全球化指标的值域是0到100,分值越高,表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被度量贸易、外来直接投资、投资组合和向外国人支付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政治全球化被度量外国使领馆数、加入国际组织数、参与联合国安理会行动数以及国际条约数的加权指数;社会全球化综合了电话通讯量、国际旅游、人均国际邮件、国际迁移等二级指标,它们都取自加斯顿(Noel Gaston)和马滕斯(Pim Martens)所设计的KOF全球化指数。^①该数据的时间起点是1970年,在本文完成时已经更新到2014年。它在全球化经验研究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②人口全球化的测量以2000年新接收的移民为基点,每一万人口中外国移民的人数,其中移民数据和总人口数据分别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移民数据库(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和世界银行

^① Axel Dreher,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Index of Globalization", *Applied Economics*, Vol.38, No.10, 2006, pp.1091-1110, <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 last accessed on 12 October 2017.

^② 例如 Nisha Mukherjee and Jonathan Kriekhaus,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Well-Being", pp.150-170; 张中元:“论全球化、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136-155页。

搜集并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①人口全球化和其他维度全球化的度量方式不相同,所以并不匹配,而且前者相对而言较为粗糙。这是下一步解读统计分析结果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个指标基本符合我们对于人口全球化的定义。而且,它与KOF数据中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以及综合指数的皮尔森系数都很低,分别为-0.0346、-0.0978、0.2182和0.0235,所以不存在多重线性关系,不会干扰统计分析的结果。

(三)控制变量

微观/个人层次上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水平、宗教信仰、财务状况、身体状况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的评价。

性别是一个二分变量,包括“男”(1)和“女”(2)。幸福科学的经验研究普遍表明,女性由于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期待比男性小,所以承受的压力也较小。此外,女性由于性别的原因比男性更倾向于通过感情冲动来宣泄消极情绪,所以幸福程度更高。^②所以期待这个指标与结果变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年龄对SWB的影响则被反复发现是非线性的:人们在年轻时由于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较大,幸福感较小,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功成名就,或者适应性增加,幸福感也相应增强。^③为此,我们控制了年龄和年龄的平方两个变量,估计它们与生活满意度分别呈负的和正的相关关系。

此外,教育程度被度量为“全职教育”的年数。不少学者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可能掌握机会和资源,相应地也更开明、更适应社会生活,生活满意度也更高。^④宗教信仰则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可以抗拒现实生活的风险和不如意,提高幸福感。^⑤本文把在ESS中报告自己“属于某个宗教或教派”的被调查者度量为有宗教信仰。经济状

^① 数据来自 OECD 网站,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MIG>, 2017年10月12日访问;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017年10月12日访问。

^② Wendy Wood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Positive Well-Being: A Consideration of Emotional Style and Marital Stat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06, No.2, 1989, pp.249-264; Gary Lee et al., “Marital Status and Personal Happiness: An Analysis of Trend Dat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53, No.4, 1991, pp.839-844; Andrew Oswald,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Journal*, Vol.107, No.2, 1997, pp.1815-1831.

^③ J. Brandstader and G. Renner, “Tenacious Goal Pursuit and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Explication and Age-Related Analysis of Assimilation and Accommodation Strategies of Coping”, *Psychology and Aging*, Vol.5, No.1, 1990, pp.58-67; Carol Ryff, “Possible Selves in Adulthood and Old Age: A Tale of Shifting Horizons”, *Psychology and Aging*, Vol.6, No.2, 1991, pp.286-295; Derek Bok,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02-103.

^④ Robert Witter et al., “Educ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Vol.6, No.2, 1984, pp.165-173; Edi Diener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ative or Absolut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28, No.3, 1993, pp.195-223.

^⑤ Christopher Ellison, “Religious Involvem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32, No.1, 1991, pp.80-99.

况直接影响物质甚至精神需求的满足,但在群体/国家层次上却存在着“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s Paradox),^①即在人均收入到达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不再显著地增进主观幸福感。但对于个人而言,良好的经济状况是幸福的基础。^②泰(Louis Tay)等的研究也表明,债务既直接地降低人的幸福感,又通过加剧对经济状况的忧虑来间接地降低生活满意度。^③ ESS 中关于财务状况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最近的收入状况如何?”,答案则有四个选择,分别是“情况很好”(1)、“勉强够用”(2)、“不够用”(3)和“很困难”(4)。它显然是一个定距变量。本文将这一变量乘以-1,以便于阐释。

与此同时,人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也存在紧密的联系。比如,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的 SWB 显著低于普通人。即使控制了经济-社会地位、人口学状况、患病时间、体脂率、糖尿病并发症的数量以及抑郁等因素,这个结果也很稳定。^④糖尿病这样的疾病会直接影响人的健康感受,而身体感受消极的人很难保持良好的心态,^⑤所以本文推测主观健康状况与 SWB 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在 ESS 中,被调查者要对自己的总体健康状况作出评价,从“很好”(1)到“很差”(5),共五个刻度。为了便于阐释,本文也将这一变量乘以-1。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它为人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庇护和安慰。无论是正式的婚姻关系,还是稳定、持久的非婚姻两性关系,都被发现显著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或者甚至是幸福最重要的来源。^⑥在 ESS 中,如果被调查者对两个

^① Richard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in Paul David and Melvin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pp. 89-125; Richard Easterlin and Laura Angelescu, “Happiness and Growth the World Over: Time Series Evidence on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IZA Discussion Paper*, No.4060, March 2009, pp.1-31.

^② Edi Diener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ative or Absolute?”, pp. 195-223; Edi Diener et al., “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69, No.1, 1995, pp.130-141.

^③ Louis Tay et al., “Deb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Other side of the Income-Happiness Coi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8, No.3, 2017, pp.903-937.

^④ Elizabeth Holmes-Trustcott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Adults with Diabetes: Results from Diabetes MILRES-Australi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7, No.1, 2015, pp.1205-1217.

^⑤ Linda George and Richard Landerman,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Replicate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Vol.19, No.2, 1984, pp.133-156; M. Okun et 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Vol.19, No.1, 1984, pp.111-132.

^⑥ Walter Gove and Hee-Chon Shi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Divorced and Widowed Men and Wome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10, No.1, 1989, pp.122-144; Ane Mastekaas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Marital Dissolution: Selection Effec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15, No.2, 1994, pp.208-228; Peter Gundelach and Svend Kreiner,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Vol.38, No.4, 2004, pp.359-386; Toshiaki Tachibanaki and Sayaka Sakoda, “Comparative Study of Happiness and Inequality in Fiv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Toshiaki Tachibanaki ed., *Advances in Happiness Researc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97-118; Sun Sun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ubjective Health Status, Age, Sex, Region,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Stud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7, No.2, 2015, pp.838-873.

问题中的一个作出了肯定回答,就被认定为处于婚姻状态。这两个问题是:“你的合法婚姻状况如何?”和“你曾经选择同居而不结婚吗?”。

此外,欧洲一体化是欧洲人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体化的进程深刻地影响到欧洲国民的日常生活,所以,本文预测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持积极态度的人生活质量会更高。这也是一个定距变量,是对“欧洲一体化需要进一步深化,还是已经走得太远”这个问题的回答,答案为从“已经走得太远”(1)到“需要进一步加强”(10)。

本文的计量模型也控制了若干宏观/国家层次变量,具体而言包括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欧洲一体化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就是人均GDP。国家发展程度越高,就有更多的资源为公民提供更多福利,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①通货膨胀率上升意味着货币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下降,很容易激起人们的负面情绪。^②就业则既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又是个人社会存在和成就感的基础。反过来说,失业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③这三个指标的数据都取自《世界发展指标》。^④

本文把宏观层次的欧洲一体化设定为具体年份与1951年的差。欧洲一体化的制度起点是1951年建立的欧洲煤钢联营,此后虽然不断有波折,但一体化始终在不断深化。这个设定有其合理性:它既模拟了政治组织/实体的组织/行为能力,又代表其合法性,因为两者都需要时间来成长和发育。所以,在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研究中,学者们比较经常地使用这一变量以及它的平方来度量制度、组织或政治实体的能力与合法性。^⑤欧洲一体化是以组织形式展开的,可以认为基本适用于这个逻辑。尽管瑞士、冰岛等是非欧盟成员国,但也会受到一体化的影响。实际上,欧盟数据中心提供了

^① Benjamin Radcliff, “Politics, Marke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Happin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4, 2001, pp.939-952; Ronald Inglehart et al.,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A Global Perspective (1981-2007)”,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3, No.4, 2008, pp.264-285.

^② Alberto Alesina et al.,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88, No.9/10, 2004, pp.2009-2042; Frederic Pryor, “Happiness and Economic System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51, No.3, 2009, pp.367-383.

^③ Ronald Kessler et al., “Unemployment, Reemployment, and Emotional Functioning in a Community Samp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4, No.4, 1989, pp.648-657; Mikael Nordenmark and Mattias Strandh, “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Well-Being among the Unemployed: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Sociology*, Vol.33, No.3, 1999, pp.577-597.

^④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017年10月12日访问。

^⑤ Robert Jackman, *Power Without Force: 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Nation-Stat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pp.90-94; Cameron Th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9, No.3, p.724; Emizet Kisangani and Jeffrey Pickering, “Rebels, Rivals, and Post-colonial State-Building: Identifying Bellicist Influences on State Extractive Capabi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1, 2014, p.193.

度量一体化进程的更精确的 E-28 指标,包括单一市场、协同性(homogeneity)、对称性(symmetry)等次级指标以及加总而成的综合指标。^①然而,该指标却不是年度的,迄今为止只包含 1999 年和 2012 年两年。由于本文的分析时间是 2002-2014 年,使用该数据很可能导致较大的偏差,所以不予采用。

西欧国家都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主要功能是为老人、穷人、失业者和单亲家庭等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以帮助他们规避残酷的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因此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②按照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被广为接受的观点,福利国家分为自由主义(以英国及其前殖民地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法国、德国、奥地利为主)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北欧国家为代表)三种类型,^③其中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套保障,相对于鼓励参与市场竞争的英美和重视工作绩效的德国,北欧国民所面临的压力最小,所以估计幸福感也更强。^④

对于多层次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采取了不同的回归分析方法。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使用的是最小二乘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OLS)和层级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⑤有学者选择普通的有序 probit/logit 模型。^⑥还有学者选择 Huber-White 稳健标准差模型或多层次混

① Jörg König and Renate Ohr, “Different Efforts in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EU-Index”,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1, No.6, 2013, pp.1074-1090.

② Benjamin Radcliff, “Politics, Marke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Happiness”, pp.939-962.

③ 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p.8-34.

④ Alexander Packe and Benjamin Radcliff, “Assess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6, No.2, 2008, pp.267-277; Alexander Packe and Benjamin Radcliff, “Welfare Poli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Nations: An Individual-Level Assessmen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89, No.1, 2008, pp.179-191.

⑤ Mikael Nordenmark and Mattias Strandh, “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Well-Being among the Unemployed: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Sociology*, Vol.33, No.3, 1999, p.585; Mirna Safi, “Immigrants’ Life Satisfaction in Europe: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6, No.2, 2000, p.162, pp.167-168; Ronald Inglehart et al.,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A Global Perspective (1981-2007)”, pp.270-271; Carol Graham and Andrew Felton, “Does Inequality Matter to Individuals Welfare? An Initial Exploration Based on Happiness Surveys from Latin America”, in Amitava Dutt and Benjamin Radcliff eds.,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p.184, pp.189-191, p.194; Richard Easterlin and Laura Angelescu, “Happiness and Growth the World Over: Time Series Evidence on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pp.1-31; Zohal Hessami,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 *Kyklos*, Vol.63, No.3, 2010, pp.346-382.

⑥ Carol Graham and Andrew Felton, “Does Inequality Matter to Individuals Welfare? An Initial Exploration Based on Happiness Surveys from Latin America”, p.184, pp.189-191, p.194; Zohal Hessami,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 *Kyklos*, Vol.63, No.3, 2010, p.354; Rubia Valente and Brian Berry, “Working Hour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7, No.3, 2016, pp.1173-1204.

合模型。^①

生活满意度这个结果变量是个有序等距变量,从0到10共有11个刻度,所以可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而不是使用回归结果难以直接解释的有序logit/probit模型。^②另一方面,本文统计模型纳入的变量是嵌套的,包括个人和国家两个层次。一国之内的个人通常会比不同国家的个人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这样的数据结构违反了回归分析的观察独立性原则,影响到结果变量的方差。鉴于此,本文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来控制个体的国别性。^③该回归在STATA中的命令是xtmixed。

五 经验发现与分析

本文的统计分析设置了两组多层次回归模型,两者的区别在于控制变量略有不同。具体而言,第二组模型控制了“对欧洲一体化的评价”这个微观变量,而第一组则没有。原因在于:这个微观变量只在ESS的第二、四、七次调查中使用过,而其他微观变量则出现在全部七轮调查中。如果在回归模型中纳入该变量,数据会减少约50%,严重削弱了经验发现的外部有效性。但是,这个变量对于衡量欧洲一体化对西欧国民主观福利感的影响又至关重要,所以,本文根据是否纳入这个变量设置了两组回归模型,既控制了至关重要的控制变量,又可以观察这个变量对模型整体拟合能力和对自变量作用的影响。由于这个差异,第一组模型的观察数从188158到205949不等,而第二组模型的观察数总体上则从126854到128834不等。

表1和表2显示了多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两张表格各包括7个模型,其中模型1-4分别控制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人口全球化四个自变量。模型5同时纳入这四个变量。模型6和模型7则分别控制由经济、政治和社会全球化加总而成的全球化综合指数以及综合指数和人口全球化。

^① Suzanne Coshov and Benjamin Radcliff, “Labor Organ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American States”, in Amitava Dutt and Benjamin Radcliff eds.,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pp.289-291; Elina Kestilä-Kekkonen and Peter Söderlund, “Is It All about the Economy? Government Fractional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cross Europe, 2002-2013”, *Government & Opposition*, Vol.52, No.1, 2017, pp.112-113.

^② Jeffrey Conroy-Krutz and Nicholas Kerr, “Dynamics of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in Transitional Settings: Evidence from a Panel Study in Ugand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68, No.3, 2015, pp.593-606.

^③ 类似模型选择参见 Steven Miller,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0, No.6, 2013, p.685。虽然该文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但作者认为这个回归模型也适用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参见 Sophia Rabe-Hesketh and Anders Skrondal, *Multilevel and Longitudinal Modeling Using Stata* (Second Edition), Austin, TX: Stata Press, 2008, pp.62-66, 186-196。

对比两个表格发现,是否纳入“对欧洲一体化”这个微观层次变量虽然导致了两组模型外部有效性的差异,但对于自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都没有影响。鉴于此,本节的说明和阐释以表2为主。在模型1-7中,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人口全球化和全球化综合指数都显著降低了欧洲国民的幸福感,唯一例外的是政治全球化变量。以表2为例,在模型2中,它的系数为-0.0166,在5%水平下显著,但是在模型5中的系数变成了0.00581,丧失了显著性。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全球化的其他三个维度的情况下,政治全球化的影响由负转正。就自变量的影响而言,对比表1和表2还可以发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表2中,自变量的绝对值略大于表3。例如,同样是模型5,自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在表2中比在表1中大,经济全球化的系数是0.0336对0.0224。根据包括四个自变量的模型5这个主模型,五个假设中的四个都获得了经验支持。具体而言,模型5证实了H1(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H3(社会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下降)、H4(人口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主观幸福感下降),但证伪了H2(政治全球化导致西欧国民生活满意度上升)。尽管人口全球化的衡量方式与全球化的其他维度不同,但在模型7中,人口全球化和全球化综合指数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并且数值都是同向的负值,即-0.022和-0.031,故可认定为H5提供了支持,即全球化总体上削弱了西欧人的幸福感。

从自变量的影响大小来看,经济全球化最强(在模型7中的值是-0.0336),其次是人口全球化(-0.0239),再次是社会全球化(-0.0121),最后是政治全球化(0.00581),尽管其作用在控制了全球化兄弟变量的模型7中不显著。这个序贯排列也符合我们的直觉:经济安全是最基本的价值,其次才是移民所带来的经济竞争和文化冲突;相较于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更贴近欧洲普通国民的生活,所以对幸福感造成的冲击也更大。

在控制变量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两个指标,即微观层次的“对欧洲一体化的评价”以及宏观层次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相比几个关于全球化的自变量,在9个模型中,这两个变量的影响都显著并且正相关。换言之,欧洲一体化显著提高了欧洲国民的生活满意度。而且,这两个变量的实质影响在诸模型中也相对稳定。以表2为例,“对欧洲一体化的评价”这个变量在七个模型中影响的均值约为0.0464;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其实际影响的波动略大一些,均值大约为0.025。这两条证据支持了欧洲一体化制度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在西欧国民对全球化不满程度普遍上升的同时,欧盟为他们提供了显著的幸福来源。这个发现应该说较多地支持了关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第一种理论,那就是两者很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关

系。

微观层次上的其他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显著性、方向和数值上都相对稳定,根据表2,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财务状况、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变量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且,除了教育程度之外,其他变量的作用都符合预期的方向。比如,年轻人往往对生活不满意,而老年人则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然而,系统教育年限却与幸福感成反比,这是一条反直觉的经验证据。通常认为,教育程度与人们的社会地位、职业成就基本成正比。这样的人更有机会成为社会的精英,所以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会相对较高。然而,我们的经验发现更接近于较早时期一些学者对美国人幸福水平的研究,那就是教育程度与SWB的关系可能并不显著或者即使是显著的,其作用也是负面的。这些学者提供的解释是,教育可能只会对SWB产生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教育有助于人们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断进步,或者适应环境的变化,但同时又会提高人们的期待。^①正是由于教育程度较高者对个人成就和社会发展的期望更高,如果与教育程度较低者一样都处于失业状态,那么他们的挫折感会比后者强得多。^②

本文在宏观层次上也控制了若干其他变量。一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扬、失业率上升都令生活质量显著地下降。另一方面,在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国民的幸福感显著更强。度量国家发展程度的人均GDP这个指标虽然也符合预期,积极地作用于幸福感,但是它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原因可能在于:虽然西欧十八国之间的人均GDP差异很大,在统计样本中,最低16638美元,最高47079美元,但它们都达到或超过了中上等发展水平。按照“伊斯特林悖论”,一个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约12000美元后,它对生活质量的边际影响就急剧下降,所以,表1、表2中不显著的结果,可以视为对“伊斯特林悖论”的支持。

此外,本文还对上述两组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测(robustness)。具体的操作办法是用幸福感(happiness)这个结果变量替代生活满意度。这个指标的数据也取自ESS,原问题是“总体上,你认为自己有多幸福?”,答案为从“很不幸福”(0)到“很幸福”(10)。通常认为,幸福感是即时的,是情感反应(emotional affects);生活满意度则是历时的,是由情感性和认知性共同主导的评价。检测结果表明,无论就自变量还是控制变量而言,回归模型运行的结果与使用生活满意度的模型高度相似,表明至少就替代

^① Ed Diener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ative or Absolute?”, pp. 195-223.

^② Andrew Clark and Andrew Oswald,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Economic Journal*, Vol.104, No.424, 1994, pp.648-659.

结果变量这个稳健性检测手段而言,本文的经验发现是相对可靠的。检测结果同时也说明,对于西欧国民而言,幸福感与生活质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区别。

六 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大起大落。如果说民意是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基础,那么近些年全球化在发达工业化国家遭遇挫折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国民对全球化的评价逐渐转为消极,这种情绪又经过“民主”制度以公共政策的形式表达出来。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极右势力在欧洲的兴起以及普通国民强烈的反移民情绪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酝酿的民意在政治上的反映。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反全球化浪潮表明,全球化对西欧国民主观福利的总体影响是消极的。它带走了工作机会,带来了经济竞争和文明冲突,导致了人们文化上的挫折感和精神上的失落,威胁到西欧人的文化、经济甚至人身安全,显著地降低了西欧人的生活质量。

本文的发现体现了主观福利研究的独特价值,那就是它超越了从人的选择来倒推个体偏好的传统研究路径,直接面对人的内心世界。政治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回避主观幸福问题,主要的理由是SWB难以准确捕捉和度量以及在群体/社会间不具备可比性。他们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客观福利,比如人均GDP、人均住房面积、受教育程度等相对容易观察和测量的指标。学者们假定人的幸福感与客观福利的实现成正比,所以,如果客观福利值高,那么个人的幸福感也就比较强。实验和临床心理学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表明,SWB数据是有效的,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干扰因素,但大体上反映了个人真实的效用或内心感受;SWB也是可靠和一贯的,从长时段来看也相对稳定;而且,只要采取恰当的度量方式,SWB在人际间和国家间也是可比的。^①“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则从经验上质疑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家以选择倒推偏好的路径。伊斯特林(Ronald Easterline)通过对1946-1970年间包括美国在内的19个国家的权威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虽然二战结束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人均GDP和收入持续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却没有随之显著提高。^②在2009年的经验研究中,伊斯特林

^① Rafeal Di Tella and Robert MacCulloch, "Some Uses of Happiness Data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0, No.1, 2006, pp.25-46; Daniel Kahneman and Alan 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0, No.1, 2006, pp.3-24; Frey Bruno and Alois Stutzer,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Human Well-Be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0-25, 30-36.

^② Richard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in Paul David and Melvin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pp.89-125.

等把分析样本扩大到包括 11 个发达国家、9 个发展中国家和 11 个转型国家在内的共 37 个国家,最终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收入增长和幸福感在短期内呈现正相关关系,原因是宏观经济条件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两者并不存在相关性。^①“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和政策启示在于,既然物质福利与主观幸福感不是始终呈线性正相关关系,那么就有必要将两者区别对待。

全球化的确给西欧国民带来了更多的生活便利和物质享受。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其内生的弊病也不断暴露出来,日益威胁到西欧国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领域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致了普遍的反感。欧洲国民对全球化的负面心态体现了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强烈的失落感。对于西欧的政治家来说,如何提振民众对全球化的信心是一个重要的使命。如果说建立大同世界是全球化的终极目的,那么实现“可掌控”的全球化则是当务之急。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少数人从中受益而多数人利益受损,以及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对于有着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来说,这些偏差是难以接受的。如何充分发挥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同时尽可能回避其消极影响,这是全球化能否在欧洲继续深入推进的关键。

西欧国民对全球化的失望凸显出欧盟的重要性。尽管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有着相互促进的一面,但是,地区一体化毕竟为西欧提供了一道应对和规避全球化风险的防火墙。近几年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尤其是 2016 年的英国公投退欧,对欧盟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实际上,一体化过程中的这些曲折,恰恰是成员国国民对欧盟应对全球化、难民潮等负外部性不力的一种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体化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欧洲如何处理全球化所导致的一系列负外部性。可以认为,无论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如何,政治的终极决定力量还是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技术变革是当今世界全球化一个主要的外生刺激因素,^②但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似乎并不取决于技术进步本身,而是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和评价,这就使得全球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成为一个具备较强理论和政策意义的论题。

本文在性质上是经验研究。由于因变量数据的时间跨度是 2002-2014 年,本文的论证相应地聚焦在进入新千年之后。这让本文至少在形式上具有较强的“数据驱动”性。前文曾论及,从时间上看,全球化负外部性的显现主要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本

^① Richard Easterlin and Laura Angelescu, “Happiness and Growth the World Over: Time Series Evidence on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pp.1-31.

^② Geoffrey Garrett, “The Causes of Globalization”, pp.941-991.

文的探讨也以此为背景,故而应在审慎解读本文立论的同时,注意其时间上的外部有效性问题。而且,鉴于本文对人口全球化的度量较为粗糙,与对全球化其他维度的操作并不匹配,因此需要更精细、更系统的数据来比对本文的经验发现。同时,本文在方法论上还有一个不足,那就是尽管本文的数据结构是横截面时间序列,但在分层次回归分析中并没有考虑时间因素。作出这种保守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如前所述,幸福科学领域代表性的学者在处理类似数据时,并没有考虑时间因素;二是克雷夫特(Ita Kreft)和德·里夫(Jan De Leeuw)等在多层次分析领域声名卓著的学者在处理这种数据时,也没有作相应的时间序列分析。^①尽管如此,有学者已经对方法论上的这个不足表示了合理的质疑,并提出了技术上改进的途径,^②应该说这为SWB经验研究指明了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此外,由于数据和研究设计的限制,本文既无法展示新千年之前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高歌猛进时期欧洲国民的幸福程度,也无法揭示全球化的影响从积极转向消极的拐点和轨迹。例如,从二战结束直到石油危机爆发之前,西欧国家出于经济重建的目的,对外来劳动力产生了旺盛的需求,实行很宽松的移民和福利政策,同时不断地扩大移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吸引主要来自前殖民地的劳工。从石油危机到冷战结束,由于经济下滑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增加,西欧国家开始限制移民,压制他们的公民和社会权利,但仍然鼓励家庭团聚。可以推想,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期间,人口全球化对西欧公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很可能是积极的。这些都是下一步的研究要回答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探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幸福感与全球化的关系,比如美国、中国、拉丁美洲、东南亚、南亚、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下一步也可以比较发达工业化国家(如OECD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存在着系统性差异。鉴于全球化至少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人口四种内涵,而主观幸福感由家庭、经济状况、事业等多个维度组成,那么不同维度的全球化如何影响幸福感的不同内涵则是更具政策研究价值的议题。同样有意义的是反向的研究:既然民意是公共政策和政治的基础,那么民意至少间接地会影响到全球化的进程,为此,我们也有必要思考SWB在中长期是如何作用于全球化的。

(作者简介:卢凌宇,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美]伊塔·克雷夫特、简·里夫:《多层次模型分析导论》,邱皓政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6-110页。

^② Malcom Fairbrother, "Two Multilevel Modeling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Comparative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set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2, No.1, 2014, pp.119-140.